

经济全球化与“中国制造”:一个基于价值链增值视角的研究

孔令丞 郁义鸿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 上海 200433)

[摘要] 本文通过对现有理论的阐述和分析,提出制造业价值链增值的“哑铃”型结构特征,并在深入分析“中国制造”在全球制造业中的地位的基础上,提出充分利用外部资源加快禀赋结构的升级,用“以竞争求技术”替代“以市场换技术”,采用信息化延伸制造业价值链,从而实现在全球制造业价值链中的增值效应。

[关键词] 经济全球化 中国制造 价值增值链 **[中图分类号]** F045.31 TB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857(2005)01-0058-04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MADE IN CHINA: A STUDY ON THE VALUE ADDED BASED ON THE VALUE CHAIN

KONG Ling-cheng YU Yi-hong

(School of Management,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 China attaches itself to the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under the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is titled the “world factory”. The benefit denudation in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of the world makes it be not a match for the title.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dumbbell” structure of the value-added of the value-chain in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based on the theory in existence, and on the basis of the analysis of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 China, using the outside resources to speed up the upgrade of the structure of the resource endowment, substituting the “obtaining the technology by the competition” for the “trading market for technology”, making the use of the informationalization to extent the value-chain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China's effect of the value-added of the value-chain in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of the world.

Key Words: economic globalization, made in China, the value-added of the value-chain

CLC Numbers: F045.31 TB **Document Code:** A **Article ID:** 1000-7857(2005)01-0058-04

1 现实背景:“中国制造”在全球中的地位

自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开放以来,我国产业的国际化

程度不断提高,其突出表现之一是外国直接投资(FDI)呈现出不断增强的态势,目前我国的FDI已占到全球的10%^[1]。这些年来我国制造业的增长速度明显快于世界平均水平,

收稿日期:2004-05-13。

基金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20040350439)。

作者简介:孔令丞,女,1963~,上海邯郸路220号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博士,主要从事产业经济方面研究;E-mail: ling-cheng kong@sina.com。

具体投向后,要建立项目评估指标体系,对财政投资资金使用进行科学完善的管理。应按照农业发展的趋势,遵循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相结合的原则,对项目进行事前论证、事中检查、事后验收,并建立一套科学规范的项目评估指标体系来确保财政对农业投资资金的使用效率。

市场机制作用的结果,必然使资源由利润较低的农业部门向利润较高的非农业部门流动,政府作为宏观调控的主体,应该通过宏观调控来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实现农业资源配置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统一。因此,政府一方面要通过对农业的扶持和保护以提高农业的比较效益,并通过适度规模经营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另一方面应从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整体出发,摒弃经济行为中短视的趋利化行为,创造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

参考文献与注释(References)

- [1] 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 中国公共政策分析(2002)[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 [2] 曹思源. WTO与中国[M]. 北京:团结出版社,2001
 - [3] [美]布坎南. 公共财政[M]. 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1
 - [4] [美]舒尔茨. 论人力资本投资[M]. 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0
 - [5] 罗剑朝. 中国农业投资与农业发展 [M].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
 - [6] The Farm Security and Rural Investment Act of 2002 [C]. <http://www.laecn.com.cn>
 - [7] Has Japanese Agriculture Protection Had Its Day? Policies for the new millennium [C]. <http://www.rirdc.gov.au/pud/shortreps/anu36a.html>
- (责任编辑 邱夜明)

FDI 的贡献是重要原因。从 1980~1997 年的 17 年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世界的比重从 1.4% 上升到 5.9%^[2],在世界制造业中名列第四位,并有继续提升的趋势。此外,跨国公司在我国建立研发机构也对我国制造业资源禀赋结构的升级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研究表明,我国正在迅速成长为一个具有低工资和高技术人才双重优势的国家。在我国进行研发有利于降低劳动力成本,从而对跨国公司总体开发成本的降低产生积极的作用,同时也产生外溢效应,对我国制造业的价值增值具有明显的提升效应。21 世纪的头几年,许多大型跨国公司纷纷在我国建立研发基地,致使许多国内外业界人士提及中国制造业时,又在“世界工厂”之上冠上一个更漂亮的名称:“世界实验室”。

然而,问题的另一面却并不十分令人乐观,大多数学者认为,中国还远未成为“世界工厂”,更难以被赋予“世界实验室”的称号。一般而言,能够称得上“世界工厂”的国家不仅能为世界各国提供制造业产品,而且其制造业的规模和能力也要大到足以影响全球的产量和价格,并以此从国际分工体系中获得产业价值的最大增值。以曾被誉为“世界工厂”的英国为例,在 19 世纪上半期,仅占世界人口 2% 的英国曾掌握着全球近 1/2 的工业品生产和近 1/4 的贸易,全世界 53% 的铁、50% 的煤、70% 的纺织品全都是在英国本土生产的。更重要的是,英国不仅是世界各国工业消费品的主要供应者,而且还是工业装备的主要供应者,以至于发生在这一时期的美国和欧洲大陆各国的工业革命,都在不同程度上是靠从英国输入的技术装备开展起来的。再看后来居上的美国,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美国的制造业总产值占到了整个欧洲全部制造业产值的 1/2、世界工业产值的 1/3 以上^[3]。在科技进步和知识经济快速发展的时代,美国“世界工厂”又被赋予了新的含义,即不仅在数量结构和贸易结构等方面成为全球制造业中心,更重要的是在制造业的高端技术领域居世界首位,二者合而为一使美国制造业占据了全球霸主的地位。

相形之下,我国的制造业无论在规模还是在价值增值方面都仍与“世界工厂”的地位存在相当大的差距。2000 年,我国制造业的总体规模只及美国的 1/5、日本的 1/4;人均劳动生产率仅为美国的 1/25、日本的 1/26;产品贸易总额也只占到世界的 4.7%^[2]。就结构方面的特征来说,对制造业实力最具影响的装备制造业在制造业中的比重仅为 26.5%,远远低于美国的 41.9%、日本的 43.6%、德国的 46.4%。对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有决定作用的主体技术严重依赖于国外,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的设备投资有 2/3 依赖进口,真正具有原创或控制核心技术的产品所占比例极低,依附跨国公司的组装工序所占比重还很大。由此可见,我国制造业无论从规模、效率上,还是在技术实力上,不仅无法对全球制造业产生影响,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还会受国际市场规模和价格波动的影响。就我国制造业的微观基础而言更是差强人意,2001 年世界“500 强”中,我国企业上榜的 11 家中没有一家是制造业企业;我国外贸“200 强”中,前 3 名都是外贸代理公司,并且在这“200 强”的企业出口值中,有 74% 是通过加工贸易的方式实现的。我国大多数制造业企业远未达到规模经济性的要求,使得企业竞争力的现状难以面对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2]。

特别值得强调的是,尽管按纵向比较,我国制造业已经

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从产业链的价值增值角度来看,所谓“中国制造”的大多数仍是低附加价值的产品,大量企业所扮演的角色只不过是外资企业的“打工仔”而已。毫无疑问,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导致发达国家和地区的部分制造业进一步向我国转移,并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我国制造业的产业规模和技术实力。但总的来看,所转移的产业基本上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或资金、技术密集产业的劳动密集加工环节,大量技术含量高的部分并没有随之转过来;即使有一部分跨国公司在我国建立了研发机构,也主要是从事一些需要本地化的技术工作。我国多数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薄弱、品牌培育不足、产业配套能力不够,种种原因使得资源禀赋结构升级受阻。此外,我国知识产权制度尚不健全,创新成果难以得到有效保护,企业在远未收回研发成本之前就被迫卷入零利润的价格战,这又进一步限制了外资向我国输出高端技术,加剧了制造业资源禀赋结构升级的困难。

2 理论争鸣:要素禀赋结构升级的逻辑

弗农 (Vernon, 1966, 1979) 的国际产品周期理论 (International Product Life Cycle Theory) 认为:跨国公司向发展中国家只能转移产品成熟以后的技术,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发展中国家在参与全球化分工过程中,不可能取得国际上最先进的技术。但对我国的实证分析却得出了与此相反的结论,即:跨国公司在华使用的技术不仅普遍高于我国同类企业水平,更有相当比例的跨国公司提供了填补我国空白的技术,而且,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的进一步提高,跨国公司的对华投资中使用母国先进技术的比重也在不断增加^[3]。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引进外资最多的国家,我国本土市场上的竞争也越来越具有国际市场竞争的特点。在竞争的日趋激烈和技术周期的日益缩短的情形下,在华的外资企业只能将母国先进的技术不断投入到中国市场,才可能取得较好的竞争优势。由此看来,国际产品周期理论并没有考虑到,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会成为发达国家某些高技术产品竞争的主战场。同时,技术进步和现代消费观念不断缩短着产品的生命周期,加快了研发投资和制造投资的折旧。为了尽快收回投资和降低成本,某些研发成果一旦具备了商业成功的可能性,只要能够与东道国的资源禀赋优势相结合,就会迅速投放到东道国市场上,以期在短时间内迅速收回成本。同时,在我国许多产品市场上,技术水平接近的企业数目不断增多,竞争也往往处于白热化状态,导致新产品投放市场不久就可能迅速卷入零利润的价格大战中去。因此,在全球化背景下,技术转移的方式就可能由只转移成熟技术而发展到在产品生命周期中的任何阶段都发生技术转移。但笔者认为,即便如此,技术转移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东道国的要素资源禀赋结构,但由于许多技术是在东道国本土中的跨国公司内部使用,外方往往具有明显的限制技术转让、防止技术溢出的意图,加之外方强大的品牌建设能力,使得产业价值链中的附加价值仍然主要被外商所获取。一般而言,产业的价值增值链“设计→制造→销售”呈现出两头粗、中间细的“哑铃”型结构,即设计和销售两端会汲取整个链条中的大部分附加价值,而外商所获得的利益恰恰位于“哑铃”的这两极。我国本土企业在参与国际分工的

过程中,以本国的资源禀赋优势参与全球制造业分工体系,所获取的价值增值大多仅仅在“哑铃”的中间环节,因而获利微薄。特别是,在技术差距日益加大的“马太效应”作用下,这一中间环节还有不断“细化”的趋势。

按照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理论和国际分工理论的观点,我国制造业要在全球化进程中获得应有的价值增值,就要在充分发挥资源禀赋优势的基础上,通过提高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能力,不断推进要素禀赋结构升级。波斯纳(Posner)的模仿差距贸易理论以及国际贸易理论,为产业转移、外溢效应和技术引进对促进一国资源禀赋结构升级提供了理论依据。实证分析也表明:在要素禀赋优势的基础上,通过积极引进 FDI、OEM 生产方式和全面介入跨国公司的全球资源配置战略,并由技术差距所形成的后发优势提升资源禀赋结构,将能增强产业的价值增值^[4]。但问题的另一方面是,在技术进步速度加快的全球化背景下,技术模仿会形成对发达国家的技术依赖,而且技术差距也可能进一步加大。而在知识产权制度不断完善的条件下,技术使用的成本也会提高,从而丧失发展中国家的资源禀赋优势。单纯立足于资源禀赋优势参与国际分工,还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产业的技术获取能力和相对比较优势,造成“贫困化增长”^[5]。因此,发展中国家通过依靠资源禀赋优势的发挥来提升禀赋结构,会和发达国家在产业技术领域产生“马太效应”,不仅无法提升禀赋结构,而且还会加大和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因此,要缩小技术差距,就要求发展中国家不能仅依靠技术模仿,而应在某些产业技术环节上选择“技术跨越”,跳过技术的某些中间环节,直接发展一部分具有自身知识产权的高尖端技术,尤其是要采用信息技术来实现要素禀赋结构“跨越式”的提升,从而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占据有利的地位。因此,全球化背景下,发展中国家应对现有制造业禀赋结构升级理论加以创新,将比较优势理论和技术差距理论有机地结合起来。

3 竞争对策:价值增值效应的全面提升

从“设计→加工→营销”这一制造过程的完整价值链来看,设计环节由于研究与开发的高技术、高风险和高投入,必然要求高回报;营销环节则由于广泛的行销网络,以及品牌的创建和维护所导致的高投入也有同样的要求;而加工环节却由于低成本劳动力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几乎是无限供给,在缺乏技术创新能力和品牌创建能力的条件下,这一环节的价值增值部分也就只能压低到获取简单劳动报酬的水平,劳动密集的加工环节在全球制造业体系中成为价值增值链中最为薄弱的一环。因此,在制造业的价值增值链的“哑铃”型结构中,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占据了“哑铃”的两头,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只能在中间环节获取极少的价值增值。由于这一加工环节属于“制造”过程,因此,以“中国制造”标识的显示性指标在整个制造过程中就处于价值增值最低的环节。就此而言,我国远不是“世界工厂”,而只是发达国家制造业链条中的廉价“加工基地”而已。

进入 21 世纪,我国制造业正越来越深入、广泛地融入国际分工体系,但却始终处于世界制造业的价值增值“哑铃”型结构中的中间环节,增值效应十分薄弱。而扭转这种现状,就要在现有的资源禀赋优势获得较大发展空间的基

础上,适时实行逆比较优势战略,变制造大国为经营大国,不断将价值增值活动延伸到“哑铃”两极的环节中去。即:一方面充分发挥现有资源禀赋优势,牢牢占据“哑铃”的中间环节,解决劳动力就业问题;另一方面花大力气通过技术跨越和品牌建设逼近“哑铃”的两极,解决参与国际分工环节的价值增值问题。就此,笔者提出以下几方面的对策思路。

3.1 充分利用外部资源,加快禀赋结构升级

我国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全面提升制造业价值增值效应的基本思路可以归结为:在充分发挥资源禀赋优势的基础上,全面介入全球制造业价值增值环节,实现在分工体系中的低位保持、中位扩张和高位渗透的目标。

我国在未来的几十年里不仅要解决城镇居民的就业和再就业问题,还要将上亿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出来,其中的大多数要转移到制造业体系中。因此,我国劳动力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会处于无限供给状态。按照资源要素禀赋优势参与制造业国际分工,可以成为我国的比较优势,但更重要的是如何实现比较充分的就业。换言之,我国制造业要在较长时期内处在世界制造业的“加工”环节,才有可能吸收庞大的劳动力大军。为此,充分发挥劳动力的资源禀赋优势,实现在世界制造业分工体系中的低位保持,是我国参与国际制造业价值增值链的现实选择。

但是,“中国制造”要适时完成从“加工基地”向“制造大国”的转变,就不能单纯地按照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我们应当通过全面深入地参与跨国公司的全球化资源布局战略,以“后发优势”提升“比较优势”,通过跨国公司在国家间转移资产、实现资产内化的经营活动,不断深入到价值增值环节较大的“哑铃”两极,促使制造业从加工层面面向较为基本的设计层面和营销层面转变,适时实行“反比较优势”战略,有效促进资源禀赋结构的升级。为此,实现在全球制造业分工体系的中位扩张,是我国在国际制造业价值增值链中的稳健性选择。

制造业价值增值效应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核心技术创新能力和品牌建设营销能力,取决于一批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规模经济显著的产业能否迅速成长为主导产业。这就进一步要求我国制造业必须要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和自主品牌,实现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转变。但目前国内的自主开发存在缺乏科技资源特别是技术开发人才的问题。因此,一种可能的对策是,国内有实力的企业应该“走出去”,改变被动参与国际分工的局面,充分利用国外科技资源,到科技资源密集的地方设立研究与开发机构或高技术企业,开发生产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技术、新产品,力争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得到更多的益处。为此,实现在全球制造业分工体系的高位渗透,是我国在国际制造业价值增值链中的跨越性选择。

3.2 用“以竞争求技术”替代“以市场换技术”

我国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实施“以市场换技术”的技术发展战略,其初衷是通过出让国内部分市场换取国外先进的产业技术。但是,跨国公司以其强大的技术创新、资金运作和市场营销能力,在许多领域都成功地击败了我国的主要竞争对手。而且,跨国公司为了保持自身在竞争中的技术优势,在核心技术领域、关键生产工艺等方面采用技术锁定战略,阻止我国获取核心技术和关键工艺环节,或以技术

内化的形式实现技术转移,这使得我国借助引进外资产生技术外溢效应来实现资源结构升级的意图受到很大挫折。“以市场换技术”的战略历经 10 多年来的实践,虽然对我国的科技创新能力和品牌运作能力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和外资企业所获得的巨大市场份额,甚至在某些领域对市场实行垄断的程度相比,国内自主开发能力和产业技术创新能力提高的进展极其缓慢,不仅没有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体系,而且还在一些产业领域内已经形成了严重的技术依赖。

目前我国的经济实力和创新能力都有了显著的提高,已经有能力转变以往单纯出让市场换取技术的思路。因此,可以采取提高市场准入条件和技术引进层次等方式,积极主动地获取国外先进技术。随着进入中国本土市场的跨国公司投资企业的不断增加,技术水平相近、市场领域相同的外资企业在中国本土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因此,如果他们要在中国本土市场上保持较强的竞争能力,就必须重视先进技术的投入。中国的汽车市场、移动通讯设备市场、办公设备市场等等,都是在跨国公司之间形成竞争局面后,不断将母国最先进的技术应用到中国市场。因此,有效的市场竞争环境是跨国公司向我国转让先进技术的重要动力。而且,随着我国市场需求档次的升级、企业创新能力的提高、产业配套能力的增强、国内市场结构的完善,跨国公司也将被迫在他们具有技术和规模优势的行业中产生投资倾斜,以增加其在中国本土市场中的竞争力。我们应充分利用跨国公司之间的竞争来迫使其实施更多的技术转移,这对于提升我国制造业的资源禀赋结构具有非凡的意义。

要有效实施“以竞争求技术”的战略,首先,要继续吸引跨国公司加大在我国的投资力度,同时要完善外资企业在中国本土市场上的竞争环境,不断提高引进外资的技术层次,逐渐实现从单纯鼓励外商在华投资设厂向鼓励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研发机构的转变,使我国逐步由跨国公司的“加工基地”向“设计中心”转变,以逼近“哑铃”价值增值链的高端。其次,要增强对技术引进的吸收消化能力,增强与跨国公司引进技术的谈判能力。2001 年我国的技术引进经费支出为 285.9 亿元,而相应的消化吸收经费支出仅为 19.6 亿元,两者的比值为 1:0.07。而同期日本的技术引进和消化吸收经费之比高达 1:3,韩国最高时期甚至高达 1:18^[6]。在引进过程中要重视技术专利和专有技术的引进,并加大对技术消化吸收的投入,形成对引进技术的系统集成和综合创新,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我国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体系。为此,加大引进技术的吸收和消化投入是增强价值增值效应的必需手段。第三,要全面介入世界制造业分工领域,对有条件的企业倡导“走出去”战略,全方位地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在世界较大范围内寻求资源的合理配置。这不仅可以提高中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而且通过主动参与并积极引导国际分工格局,可以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获取更多的利益。

3.3 延伸制造业价值链,提升价值增值效应

目前以信息产业为龙头的经济增长正由创新高频阶段转入成本竞争阶段,加快了发达国家产业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重新配置,增加了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由此带动

了技术的梯度转移,增大了技术扩散的速度,这对我国全面介入全球化进程提供了有利时机。由于信息技术是一种产业渗透性强、关联度(感应度和影响度之和)大的应用型技术,具有高催生性和高增长性的特征,可以有效地延伸制造业的价值增值链。信息产品和服务的使用过程具有规模效益递增的功能,其在制造业中的应用范围越广、程度越深,价值增值链的延伸效应就越显著。更重要的是,信息技术在制造业中的广泛应用可以极大地提高研发能力和设计水平,推动营销、运输和服务方式的变革,从而推动我国制造业的价值增值“哑铃”型结构的中间加工环节向两端的设计和营销扩散。因此,制造业的信息化过程为提高价值链增值效应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实现这一效应的关键在于我国能否有效地将信息技术导入制造业。为此就要在充分发挥劳动力资源禀赋优势的基础上,对现有制造业进行信息技术的渗透和改造,在“用中学”和“干中学”的过程中积累产业技术创新能力,实现从较低附加值的制造过程向高附加价值的研发环节延伸^[7],使要素禀赋结构超越某些特定阶段,从而提升制造业中的价值增值环节。

加大产业集聚效应将可能从另一方面延伸制造业的价值增值链。全球化的产业转移过程由以往的转移某个劳动密集环节,向研发、制造和营销一体化的转移态势转变;“环节式”的价值链“细碎化”转移正向“组团式”、“链条式”的整体化转移。产业转移的动机也由以往比较单一的成本和生产要素稀缺限制的显性动机,向优越的市场环境、舒适的生活环境和较强的产业配套能力等隐性动机转变。产业集聚不仅可以在一定区域范围内形成技术开发、生产加工和营销网络的规模优势,更重要的是可以通过集聚效应形成较强的产业配套能力。因此,制造业价值增值链的延伸,要根据我国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特点,建立与特定产业相关的各种经济活动在特定地区集聚所形成的“产业集群”,并在各具特征的制造业群落中形成价值链各环节的互动效应,以求求整体增值效应的最大化。

参考文献(References)

- [1] 龙永图,海闻. 对话中国的对外开放与贸易发展实录[J]. <http://finance.sina.com.cn.2003-12-01>
- [2] 刘福垣. 2003 中国在世界制造业的定位[J]. 战略与管理, 2003 (1)
- [3] 王洛林,江小涓,卢圣亮. 大型跨国公司投资对中国产业结构、技术进步和经济国际化的影响——以全球“500 强”在华投资项目为主的分析[J]. 中国工业经济, 2004(4):5-13
- [4] 萧政,沈艳. 外国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及影响[J].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2002(1)
- [5] 龚家友,钱学锋. 中国对外贸易贫困化增长的实证分析[J]. <http://gzcyxb.gzufe.edu.cn/last-m/2003/2003-4/12.htm>
- [6] 刘世锦,冯飞等. “产业技术进步中的公共财政政策”课题组. 全球技术进步的总体趋势、产业特征及各国政策走向[J]. 中国工业经济, 2001(11):9-17
- [7] 华民. “入世”后中国如何参与国际分工[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04(4):9

(责任编辑 肖庆山)